

历代古典文学精品丛书

文选

历



历
代

古

典

文
学

历代古典文学精品丛书

文选

历

代

1

精

品

中国书店出版社

丛
书

I262
441

中国人民大学
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

冯其庸 刘忆萱
芦荻 刘瑞莲
李永枯 吴秋滨
选注

歷代文選



中国青年出版社

前 言

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的国家，我国的文学，已经有了三千年的历史。在这三千年的过程中，我国的文学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地变化、发展、提高。一方面它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即它的内容，不断地有所扩充；另一方面，它反映现实的形式和技巧，也在不断地丰富和提高。

在我国丰富的文学历史中，散文是反映现实的一种重要的文学形式。我们这里所说的散文，是指与诗歌、小说、戏剧相对而言的一种文体，它包括着汉以后的赋和骈体文，也包括着那些随笔、杂记之类的小品，为了说得比较恰当一些，我们也可以把它叫作“文”，或者说，是广义的散文。

在文学史上，我国的散文，是与诗歌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的，它的丰富多彩的面貌，与诗歌也可以并驾而齐驱。在我国文学史上，曾产生过许多杰出的语言艺术大师，在这许多语言艺术大师中，有不少就是卓越的散文家，或者，他们既是诗人而又是散文家。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比较可信的最早的散文，是《尚书》的《盘庚》篇。这是商代的统治者晓喻他的臣民的一篇文告，现在读起来虽然难懂，但却大都是当时的口语。在这篇文告里，有一些生动的比喻，如“予若观火”，“若网在纲，有条不紊”，“若火之燎于原”，“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等

等。这些比喻，有的至今还活在我们的口头或书面语言里。这，可以说是奴隶制时代的散文，其中已含有形象的比喻，是后来发展得波澜壮阔的一条散文长流的开端。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动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一系列复杂的变更。这许多变更，在人们的思想意识里和社会的思想领域里，也引起了复杂的变化和激烈的斗争，形成了“百家争鸣”和“处士横议”的局面。在这一时期里，产生了《论语》、《孟子》、《庄子》、《韩非子》等优秀的诸子散文。同时，在当时频繁的战争和统治阶级内部的尖锐斗争中，统治阶级也不断地暴露了自己的丑恶面目，使人们增加了对现实的认识，从而也加深了对历史的认识，因而出现了《左传》、《国语》、《战国策》这一类优秀的富有现实意义的历史散文。从最早的商、周时代的散文，到《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散文，是一个长足的进展，它们不仅具有了文学的性质，而且已有了许多具有朴素的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这些作品的语言是相当生动的，而情节也往往颇为复杂，初步具有了后世传记文学和历史小说的基本特色。例如《左传·郑伯克段于鄢》这篇作品，用冷峻的笔触，相当生动地刻画了郑庄公的伪善阴险的性格，而姜氏的自私、溺爱，共叔段愚蠢、无厌的权势欲，写得也具有一定的生动性。作者为了加深对郑庄公的思想性格的刻画，还通过祭仲、公子吕（即子封）、颍考叔等人与庄公的对话，对郑庄公作了进一步地刻画。总之，通过这一段历史故事，作者比较生动而深刻地

揭露和批判了统治阶级为了争权夺利而骨肉相残的丑恶面目。特别有意义的是,当作者对他们作了比较尖锐的揭露以后,又描写了他们“其乐融融”、“遂为母子如初”的戏剧性场面,这就加深了人们对统治阶级表面上“仁慈”骨子里却是互相仇视残杀的虚伪面目的认识。《左传》在描写人物时,有时也颇能刻画出人物的某些具有性格特征的细节,如写齐庄公去私通崔杼的妻子棠姜时,轻轻地拍打着棠姜房门外的柱子,嘴里唱着歌,想催促棠姜出来(襄公二十五年)。写郑大夫子公为了证明自己的食指动有肉吃,竟赌气地“染指”于郑灵公的食鼎,“尝之而出”,最后终于弄到“弑君”(杀掉郑灵公)的地步(宣公四年)。写卫庄公看见己氏之妻的头发生得漂亮,就派人将己氏之妻的头发剃下来给自己的老婆吕姜作假发用,后来因为工匠们不堪他的虐待起来推翻他时,又偏偏逃在己氏的屋子里,他拿出一块璧来要求己氏饶命,己氏说:“杀了你,这块璧难道还跑得了!”(哀公十七年)上面这些细节描写,都相当生动,已具有一定程度的性格特征,有助于刻画不同人物的思想和性格,因而增加了这部书的文学意味。

当然,《左传》一书在描写当时那些外交家的辞令和复杂的战争场面时,尤富有特色。前者如《吕相绝秦》、《烛之武退秦师》、《臧孙谏君纳鼎》等,都能用委婉曲折的文笔,表达出当时巧妙的辞令;后者如《晋楚城濮之战》、《秦晋殽之战》、《晋楚邲之战》、《齐晋鞍之战》等,都能用简洁的语言,描绘出当时头绪纷繁、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真实地反映出

当时的历史面貌。《左传》的这种带有鲜明的文学色彩的描写,是很早就为人们所认识到的,唐代刘知几在《史通·杂说上》中曾说,《左传》在描写战争胜利时“则收获都尽”;描写战争失败时“则披靡横前”;描写国家强盛时“则滋味无量”;描写国家衰亡时“则凄凉可悯”。他说《左传》作者的艺术才能,几乎可以说是“工侔造化,思涉鬼神”,是“古今卓绝”。刘氏的评论,自然不免有过分夸大之处,但他对于《左传》的文学性质的认识,应该说是正确的。

《国语》比起《左传》来说,它的文学性要差一些,但是在某些篇章里,也有很好的描写,例如在《鲁语》:《里革更书逐莒太子仆》和《里革论君之过》等节里,就生动地刻画了一个敢于“以死奋笔”来违抗君命的直臣里革的形象。而在《越语》里,则更为生动地刻画了一个能够发愤图强、报仇雪耻的贤君勾践的形象,对于范蠡、文种等人的深谋远见,也有相当生动的描写,而对于广大人民同仇敌忾的爱国精神,也有很真实的反映。值得重视的是《晋语》里《晋献公杀子和重耳走国》的故事。这个故事结构庞大,情节复杂,描写的人物形象则相当生动。这些描写,显然不可能全是当时的事实,而是明显地有着作者的想象和虚构的。例如骊姬向晋献公所说的那些挑唆性的话,特别是夜半而泣的那些话,显然是出于作者的想象。正因为如此,柳宗元在《非国语》里批评《国语》说:“尝读《国语》,病其文胜而言庞,好诡以反伦”,“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盖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这里,柳宗元是从历史的角度来批评《国语》的,然而这一批

评，恰好反过来证明了这书的文学性。

《战国策》在先秦的历史散文里，也是一部有重要地位的文学性著作，它成功地描绘了苏秦、张仪等策士的形象，也塑造了荆轲、鲁仲连、聂政等敢于反抗强暴的英雄人物的形象。《战国策》的文章，语言精炼生动，人物的对话，既能口吻毕肖，具有比较鲜明的个性特色，又能跟随情节的发展，层层深入，纵横捭阖，锋芒毕露。特别是它每篇的结构，都比较完整，情节往往曲折动人，颇有后世历史小说的特色。例如《苏秦以连横说秦》、《邹忌讽齐王纳谏》、《鲁仲连义不帝秦》、《触龙说赵太后》等篇，既可以作为优秀的叙事散文来读，也可以看作是历史小说的滥觞。汉代的刘向曾说过：《战国策》所写的，“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战国策书录》）刘向在这里，已经注意了这书的文学性。宋代的李格非，在《书战国策后序》里更说：“《战国策》所载，大抵皆纵横捭阖譎诌相轧倾夺之说也。其事浅陋不足道，然而人读之，则必尚其说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辞之胜移之而已。”李格非认识到《战国策》文章的感染力，赞扬它“文辞之胜”，“其说之工”，这说明他对《战国策》散文的文学性，是有正确的认识的。

上述这些历史散文，对后来的历史散文和政论文的发展，都有重大的影响。

这一时期散文在另一方面的成就，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那些优秀的诸子散文。历史散文是通过叙事来说理的，

而诸子散文则主要是说理，不过在说理中也有叙事的成分，而且还运用了许多寓言故事和生动的比喻。由于这个原因，因此历史散文的现实性是通过历史的叙述，对历史的褒贬而表现出来的，而诸子散文则主要是直接说理，直接对现实问题的辩论，也就是说它的反映现实比较直接。

《论语》是诸子散文中较早的一部，它是孔子门人对孔子和他的学生的言行的“回忆录”。是一部语录体的散文。叙事简洁，语言精炼，含意丰富深刻，是这部书的特色。这是因为书中所记孔子的言行，大都是他的门人们被深深感动过的或受到很大启发的，所以书中所记孔子的言论，大都具有格言的意味。例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子罕》），“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朽也”（《公冶长》）。这些语言，都很形象而又含义丰富深刻。

《论语》因为是孔子门人回忆孔子言行的著作，所以全书虽然只是记述孔子的片言只语和某些片断的行实，但仍旧给我们描绘下了孔子的形象。他热心于政治，栖栖惶惶地到处奔走但又到处碰壁，他刻苦学习，诲人不倦，他谦虚而诚恳，他竭力提倡当时已逐渐不被人重视的“礼”和“德”，他到处宣传“仁”、“爱人”的思想，企图调和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总之，读《论语》这部书，孔子的思想、感情，孔子的举止动作、声音笑貌，常常能从朴素而精炼的语言里跃跃然地活动起来。《论语》对其他一些人的性格，刻画也颇为生动，如子路的率直粗暴、见义勇为，颜渊的谦虚好学，子贡的聪

明，都写得较为成功。尤其是《先进》章的《侍坐》一节，描写孔子师生坐而言志的情景相当生动，语言虽甚简洁，但各人的性格都比较鲜明，生活的气息也较浓厚。

当然，从全书来看，《论语》不能作为一部纯然是文学性的著作，《论语》对后来的散文虽然有影响，但比起它在思想方面给后世的影响来说，显然不如后者的影响巨大和深远。不过，从殷周时代的佶屈聱牙的散文发展到《论语》的散文，应该说同样是一个很大的进展。

在诸子散文中，《孟子》的文学成就和影响是很突出的。《孟子》基本上是孟轲本人的著作，因此全书的风格比较统一，它具有纵横捭阖、宏伟奔放的气势，它的言辞锋利，咄咄逼人，而有时又幽默诙谐或曲折入情。

孟子的思想是儒家的民本思想，所以在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权的原则下，他也尖锐地揭露了一些不知爱民的“人君”，他认为历史上的纣王是一个暴君，是独夫，应该受到人民的诛灭，他揭露梁惠王实质上是与别的君主一样地不爱人民，他与别的君主比较，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比，没有根本的差别。他讽刺梁襄王说：“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接近了他，看不见可以被别人尊敬的地方）焉。”他骂那些帮助君主剥削人民的大臣说：“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从这些说话，我们可以看到孟子对统治阶级的揭露，言词确实是十分锋利的。

《孟子》的文章，十分善于用比喻，有一些比较抽象或复杂的问题，往往经过他形象的比喻以后，就使读者一目了然

然。例如“挟泰山以超北海”、“缘木求鱼”等比喻，至今还被人们运用。

《孟子》的文章，非常富于论辩的技巧，他常常能把对方不知不觉地引导到自己否定自己的结论上去，从而使对方没有任何反驳的余地。

《孟子》的文章最大的特色，是那种雄辩的不可阻挡的气势，是那种说理的明朗性和形象性，是那种比喻的生动性和丰富性（有时是用生动的故事作比喻），是那种严密的逻辑力量。他的文章，确实具有“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的气势，因此后来的人，常称赞《孟子》的文章气盛。宋代的苏洵曾说《孟子》的文章“其锋不可犯”（《上欧阳内翰书》），苏辙也说：“孟子曰：‘我善养我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弘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大小。”（《上枢密韩太尉书》）

《孟子》的文章比起《论语》来，确实是一个重大的发展，因为它不再是《论语》式的语录体，而是发展成规模相当宏大的长篇大论的散文了。《孟子》的文章，直接影响到唐宋时代古文家的文章，它在散文史上是有突出的地位的。

与孟子同时而稍后的是庄子。《庄子》一书，内篇大体是他本人的著作，外、杂篇则是他的门人或后学所作。庄子的思想是代表当时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他对新兴的地主阶级怀着深刻的仇恨，他对封建地主阶级以及那个时代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同时又从这些批判中表示了自己对现实世界绝望和虚无的心情。庄子思想对后世起着复杂的影响，一方面，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人生观，给

后世以消极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对当时新兴的地主阶级及其意识形态（主要是封建礼教和道德观）的批判，又往往成为后世一部分文人反对封建统治和封建道德的武器。所以对于庄子思想给予后世的影响，须要根据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庄子的散文给予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的散文的总的特色，就是那种汪洋恣肆，不可捉摸，纵横排宕，光怪陆离和雄伟奇丽的浪漫主义风格。《庄子》的文章（包括外、杂篇在内），在先秦诸子中，是最富于想象力的。一个普通的事物，在作者的想象之下，往往现出特殊新奇的意味来。例如在他想象中的天，是“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耶？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这里不仅写出了人们从下往上看天时所见的深远莫测的景象，同时又想象了从“远而无所至极”的绝高的高空往下俯视时的景象。再如在他的想象的描写下，一个庖丁解牛，竟会神奇到“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乐章名）之会”。这样，现实生活中腥臊繁重的劳动，在他的笔下，竟成为一次神妙的音乐舞蹈艺术表演。不仅如此，庄子还常常凭借他奇妙的想象力，虚构和创造出一些具有浪漫主义精神的艺术形象来。他说：“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不受病害）而年谷熟。”这里他生动地刻画了一个“肌肤若冰雪”的飘飘渺渺的神仙的形象。

《庄子》一书对于儒家所代表的封建道德的批判是尖锐的，儒家所标榜的“仁”、“义”，他认为即使是强盗也是有“仁”、“义”的（见外篇《胠篋》）。《庄子》《外物》篇中的《诗、礼发冢》，对儒家的诗礼批判得十分辛辣，它生动地描绘了两个嘴里哼着《诗》、《礼》，却在半夜里偷盗别人坟墓的儒者的形象。至于《胠篋》篇里骂统治者“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等，这是早就传诵的了。《庄子》书中对那些消极对抗封建社会的隐士，也作了热烈的歌颂。这可以拿《让王》篇中对曾参的描写为代表：

曾子居卫，缊袍无表（麻袍已经没有了面子），颜色肿唿（浮肿），手足胼胝，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正冠（把帽子戴正）而缨绝（帽带就断了），捉襟而肘见，纳履而踵决（鞋后跟就裂断了），曳纵（拖着破鞋）而歌商颂，声满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故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这里曾子艰苦卓绝的生活和傲岸不屈的精神，是写得十分成功的。

《庄子》的文章，具有长江大河浩荡奔腾的气势，而又波澜重迭，变化生姿。这可以拿《逍遥游》为代表。这篇文章是在宣扬他的绝对自由的思想，这种思想，自然是应该彻底批判的。然而这篇文章却写得汪洋恣肆，变化莫测。林云铭说：“篇中忽而叙事，忽而引证，忽而譬喻，忽而议论；以为断而非断，以为续而非续，以为复而非复。只见云气空蒙，往返纸上，顷刻之间，顿成异观。”（《庄子因》）作为对这篇文

章的艺术方面的评论，这几句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与这书的汪洋恣肆的风格相适应的，是它那丰富而新奇的语言。鲁迅说庄子的文章“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莫能先也。”（《汉文学史纲要》）这是很切当的评论。

《庄子》的文章，对后世影响很大，魏晋时期的文人，很多都受它的影响，宋代的苏轼，也是受《庄子》影响很深的一位散文家。

其它战国时期的诸子散文，其较著者，还有《墨子》、《荀子》和《韩非子》。墨子本人是不主张文学的，所以他的文章质朴无华，纯是说理。然而他十分重视论辩的逻辑性，创立了“三表”法，这就是立论时，一要考察历史，求证于古事；二要揣度民情，了解现实；三要检验效果，观察实际的应用。由于这样，他的文章论证严密，议论透彻，行文条畅明快。这种特色，以他的《非攻》上最为显著。《墨子》的文章，虽然不能说有鲜明的文学性，但它对后世论辩文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他的时代早于孟子，所以他的长篇大论的论辩文的形式和严密的逻辑力量，对于孟子及以后的文章，也有一定的影响。荀子是战国后期的一位儒学大师，他的学识鸿博，因此他的散文朴实浑厚，说理透辟而又取譬精警，是学者之文。《荀子》集中还有赋篇，共有礼、知、云、蚕、箴五篇短赋，以四言为主，间用杂言，有韵，是对话的形式，文体介于骈散之间，对后来的汉赋有一定的影响。

韩非是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他的文章，严峻峭刻，抉剔世情，深入隐微，具有法家的特色。另外，韩非处于他的

祖国(韩国)危亡之际,而自己又不得任用,韩王遣他入秦以后,即为李斯所害。所以他的《孤愤》、《说难》诸篇,充满着愤怨的情绪。明代的茅坤说韩非的文章“沉郁孤峻,如江流出峡,遇石而未伸者,有哽咽之气焉”(《韩子评选后语》)。韩非也喜欢用寓言故事来说理,所以在他的集子中,还保留着许多生动的寓言故事,而且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对后世有一定的影响。

从上面概括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散文,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第一,它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它能够叙述曲折复杂的历史事件,能够有条不紊地安排许多头绪纷繁的故事情节,它也初步能够描写人物性格特征和人物的形象。从诸子散文中,我们也看到他们对现实和历史认识的深度,他们对人生作了广泛的探究,总结了某些经验。值得注意的是,除个别人物以外(如庄子),这些作家,他们对现实大都抱着积极的态度,因此他们在反映现实时(自觉的或不自觉的),不是采取消极旁观的态度,而是对现实有所批判,在不同程度上对人民有所同情的。第二,从他们的文章中,我们已经可以十分清楚的看到各个不同作家或作品的独特的个性和风格,看到他们掌握语言的不同技巧,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无论在叙事或说理中,已经注意到了文采,或者说,注意到了语言的艺术性,因此他们的作品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了文学的性质。第三,开始确立了散文的最基本的形式,这就是史传文(也可说叙事文)和议论文,后世的散文,自然还有许多发

展变化,但和以上两种形式都是有密切关系的。第四,我们应该注意到散文在这一时期,更多地被人们注意到的,还是它的实用的价值。即使是具有浪漫主义特色的艺术性相当高的《庄子》的散文,也仍然是作为一种哲理文出现的,作者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这就是说,在这一时期文与史,或者说文与理还没有区分,散文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作品,还有待于以后历史的发展。因此,在这一时期,我们还不能看到纯粹是抒情或写景等类的文章。

*

*

*

秦代为时很短,在文学上没有能像在历史上一样,显示出它的划时代的功绩。然而它却产生过比较优秀的散文家李斯。他在战国末期写的著名的《谏逐客书》是代表作。他在这篇文章里,广泛地引证史实,驳斥秦始皇横蛮逐客的错误措施,说明逐客一事在政治上对秦国的严重不利,终于使秦始皇取消了“逐客令”。这篇文章,排比铺张,结构整齐,笔势纵横,词藻丰腴,在风格上有战国时纵横家文章的余风,在结构和语言上,又开启了后来汉赋铺叙藻饰的特色,可以看出是从先秦散文到汉代散文和汉赋的一个桥梁。此外,李斯还为秦始皇写了纪功的几篇刻石文,这种刻石文字,实际上是先秦青铜器铭文的发展。

两汉的散文,我们可以分三方面来叙述:一是赋,二是政论文,三是史传文。

从我们现在来看,大部分的汉赋实在没有什么文学价值,然而在汉代,它却是极盛一时的一种文学形式。它讲究

铺叙，讲究词藻，运用对话的形式，实质上是一种介乎诗与散文之间的东西。它的独立的形式，应以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扬雄的《甘泉》、《羽猎》、《长杨》和班固的《两都》，张衡的《两京》等赋为代表。汉赋的发展是有它的社会原因的，一方面因为汉代前期社会比较安定，经济有所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有显著的增加，国力强盛，统治阶级过着奢侈享乐的生活，需要一批文人来为它歌功颂德，因此他们提倡写作辞赋；另一方面赋是一种新起的文体，它适宜于作铺张扬厉的描写，在这种情况下，赋的写作，便成为一时的风气。初期的汉赋作家，主要是贾谊、淮南小山、枚乘、孔臧等人。贾谊的《吊屈原赋》是一篇借屈原以自吊的抒情作品。赋中对于时代的黑暗，作了颇为尖锐的揭露，如说：

遭世罔极(无道)兮，遁陨厥身(乃丧其生)；鸟庖
(乌呼)哀哉兮，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鸢翱翔。阉
茸(小人)尊显兮，谗谀得志，圣贤逆曳(倒悬)兮，方正
倒植。

这显然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批判。从文体上看，这是在《楚辞》影响下的作品，所以人们把它叫做骚体赋。与此相类的是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枚乘的《七发》，则是运用对话的形式，文中洋洋洒洒，夸张地描写和揭露了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的生活，具有暴露批判现实的作用。这篇作品，与贾谊的《鹏鸟赋》、孔臧的《谏格虎赋》一样，都是运用散文的形式而在中间或句末用了韵，所以它的散文化的特色是很明显的。

初期的赋虽然没有定型，但它的思想内容却比较好，它还没有发展成为后来那种主要是歌功颂德的作品，它在形式上也还没有趋于僵化。汉赋鼎盛的时期，是自汉武帝到汉安帝的时代，这也是司马相如和扬雄、班固等的时代。司马相如是奠定汉赋形式的主要赋家，后来扬雄、班固等人的作品，在形式上都是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子虚赋》是写楚使子虚使齐，向乌有先生和亡是公盛夸楚国云梦之事（楚王在云梦泽打猎的事），乌有先生说他说言过其实，不应该夸耀这种淫乐侈靡之事。《上林赋》则是叙亡是公听了子虚乌有两人的对话以后，认为齐楚之事，皆不足道，因为他们没有听到过天子的上林苑，于是就洋洋洒洒地铺叙描写起上林苑来，最后又归之于劝诸侯节俭，略寓讽谏之义。这两篇赋实际上是一篇，形式上完全是对话体，对事物的描写则东南西北，上下左右，挨次铺叙，极尽堆砌雕饰之能事，这就是典型的汉赋的特色。

东汉中期以后，政治腐败，社会混乱，国势衰弱，再也没有过去那种强盛安定的局面，因此反映到文学方面，汉赋也就由过去铺张排比的大赋，转变为抒情、咏物或揭露社会黑暗的小赋。这一时期的作家，以蔡邕、赵壹、祢衡等人为代表。蔡邕在《述行赋》里说：“贵宠扇以弥炽兮（权贵们的气焰越来越盛）、金（皆）守利而不戢（息）。前车复而未远兮（指梁冀新诛），后乘驱而竞及（指徐、左等权贵）。穷变巧于台榭兮（府第造得越来越奢侈），民露处而寝湿；消嘉谷于禽兽兮（禽兽吃着好的谷子），下糠粃而无粒（人民连糠粃都没